



现代性之路：

The Roads to Modernity:

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

The British, French, and American Enlightenments

〔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 / 著

The B

齐安儒 / 译



现代性之路：

The Roads to Modernity:

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

The British, French, and American Enlightenments

〔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之路: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

[美]希梅尔法布(Himmelfarb, G.)著;齐安儒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7

书名原文: The Roads To Modernity: The British, French, and American Enlightenments

ISBN 978-7-309-08100-8

I. 现… II. ①希…②齐… III. 启蒙运动-对比研究-英国、法国、美国 IV. B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9998 号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7-339 号

现代性之路: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

[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 著 齐安儒 译

责任编辑/盛 亮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3.25 字数 187 千

201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100-8/B·392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我的一本文集《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Victorian Minds*),其中有一节名为“原维多利亚时代的人”(Proto-Victorian)。不,我更乐意说,“前维多利亚时代的人”(Pre-Victorian)——依照我的词典,“原”(Proto)意味着不仅在时间上是最早的,在地位或重要性上也是首要的。在这种场合,“原”意味着包括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我其他的书将这一类人扩展到承认亚当·斯密(Adam Smith)、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以及那些美国开国先驱们。现在,我很高兴将曾经处于幕后的他们推到前台,以恰如其分地向这些18世纪的思想者和运动表达敬意。没有他们,19世纪——的确,还有20世纪和21世纪——将是不可想象的。

这么多年以后,青年时代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我的第一本书,关于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将我带入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中心,但我通过法国的启蒙运动及革命接触到阿克顿的。这是我跟美国研究这个时代最顶尖的学者之一的路易斯·戈特沙尔克(Louis Gottschalk)学习时的课题。正是阿克顿对于法国革命的研究将我引向了这个时代最博学、最深刻的历史学家,并因此而发现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富矿。现在,我回到了法国启蒙运动。过去五十年来,卓越的学术成就已经差不多使这个课题彻底改观,这让我自愧不如。但那些当年激起我兴趣的问题还没有因此变得模糊,它们依然挑战着当代历史学家。

两个邀请使我回到了启蒙运动:第一个是1996年8月受邀参加教皇在冈多菲堡(Castel Gandolfo)主持的一次学术讨论会;第二个是2001年5月受邀在伦敦的英国社会科学院(the British Academy)发表埃里·

凯杜里演讲(Elie Kedourie Lecture)。在罗马的学术讨论会,其主题是“今天的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 Today),要求我提交的论文是关于贫困与启蒙运动方面的¹。我以前没有涉及启蒙运动的这个方面——大多数研究启蒙运动的历史学家也没有涉及。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英国和法国启蒙运动之间的差异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后来我在英国社会科学院所做的演讲中,我将这两个启蒙运动的主题从关于贫困的狭隘视觉拓展开来,到达更大的社会与理念问题层面。在本书中,我进一步拓展了这个主题,把美国的启蒙运动也加了进来,引入了启蒙运动——或者说这些启蒙运动——的第三个政治维度,既然我现在想到了它们。

这本薄书是一篇文论,而不是一篇综合性的学术叙事。但是,我希望它建立在最好的学术证据基础上。我广泛地引用了各种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部分是因为我的某些论点是对一些普遍看法的反驳,因而需要证实和辩解;也因为当代作家是如此地能说会道且善于思考。斯密、伯克、托克维尔(Tocqueville)、美国的开国先驱以及其他人的表述锐利、切中要害且语言优美,概括或重述只会使它们变得肤浅而粗俗,试图去转述它们,会是一种罪过。

我对这些卓越思想者的尊敬也使我对他们的词汇充满敬意。因而,在现在说“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的地方我保留了“美国”(America);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与《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一些东西(晚至1893年,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出版了他的不朽名作《美利坚联邦》[*American Commonwealth*])。同样,在那个时代所用的阳性名词和代词即使不优雅,也会有通用的含义,如果用当前正确的方式表达它们,这些含义反而会被破坏。

美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将我引入了对我来说相对有些不熟悉的领域,因此我要感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阿兰·科斯(Alan Kors),他审读了关于法国章节的初稿;我还要感谢田纳西大学的威尔弗雷德·麦克雷(Wilfred McClay),他审读了关于美国的章节。两位都做了我要求的评论性阅读,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并提供了参考书目。对于两位,我要做出如下的惯常免责声明:对我的观点或错误,他们没有任何责任。

不仅他俩为我提供了图书馆的资料,他俩的员工,包括欧洲部的卡罗尔·安布鲁斯特尔(Carol Ambruster)和学术计划办公室(the Office of Scholarly Programs)的莱斯特·弗吉尔(Lester Fogel),还为我提供了帮助和建议。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为我从国会图书馆借书提供了便利,并将他们的实习生汉斯·阿尔霍夫(Hans Allhoff)和艾琳·康洛依(Erin Conroy)借来为我服务,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年,为我找书、复印文章并搜集了很多零零散散、不引人注目的参考笔记。

能够再次与诺普夫(Knopf)的阿什贝尔·格林(Ashbel Green)合作,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快乐。这是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里,他全程操作出版的我的第九本书——我猜测,在这样一个出版商与作者的关系经常变动的时代,这多少算个纪录。阿什贝尔来负责这本书的出版,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他的一位祖先是这本书的一个配角:一位名叫阿什贝尔·格林的人在革命战争(Revolutionary War)期间服役,是国会的专职牧师,后来成为新泽西大学(现在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其后他还成为该校一位前任校长约翰·威瑟斯庞(John Witherspoon)传记的作者。这位校长在将英国启蒙运动带入美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丈夫,埃尔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就像他对我以前所有的书所做的一样,他对这本书的整个初稿都进行了审读和评论。其他很多作者都以一名编辑和指导者的身份来赞扬他,但他给我的更多:智慧的建议,善良的性情,始终如一的奉献。

序 言

本书是从诋毁它的批判者和不加评判地赞同它的捍卫者,从否认它存在的后现代主义者和轻视或毁谤它的历史学家,尤其是支配并霸占了它的法国人手中,重拾启蒙运动的一次满怀抱负的尝试(比其冗长的论辩更具雄心)¹。对于重拾启蒙运动,我欣然提议恢复英国人的地位,他们在创造它的过程中贡献良多——他们确实创造了一个和法国人迥异的启蒙运动。

传统上,启蒙运动研究的视野集中于法国,集中于哲人创造的思想和这些思想向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输出。这些思想一直都是争论的话题,但从没有像今天这么激烈过,因为现在,不是这种或那种思想处于争论之中,而是整个思想体系都处于争论之中。对于这种知性的怀疑主义,作为一个以思想的运动著称的启蒙运动显得尤其脆弱。“启蒙工程”(enlightenment project)就如它有时被惹人怨恨地说起时那样,被认为是过时的,是一种现代性的幻觉或错觉。它让我想起了一个时期,当时一些名词如“理性”、“天性”、“权利”、“真理”、“道德”、“自由”、“进步”等可以无需借助于引号而使用,对这些“特别”的概念,也没有讽刺的意味与之相称。某位作者(在一本很恰当地命名为《启蒙运动的觉醒》[*Enlightenment's Wake*]的书中)说,它假定一个仅仅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化身的“普遍解放与普遍文明”²。另一位作者解释道:“启蒙运动之于后现代主义就像‘旧制度’之于法国大革命……[它]象征着后现代主义反感的现代。”³在哲人们相信可以自由地歌颂理性,将其置于宗教之上时,后现代主义者发现理性和宗教本身一样残暴、“极权”。

其他历史学家不反对这些思想本身,而是反对过度地关注思想的启蒙运动观念。对于他们来说,启蒙运动是一次社会运动,也是(或者更是)

一次知识运动,通过更好地考察阶级与组织、社会关系与物质力量的流动,它们在法国共谋推翻旧制度,为大革命铺路⁴。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已将他的分析运用于《百科全书》这个哲人们的期刊上,通过分析它筹办与发行的模式、它所吸引的作者以及它招致并逃避的审查,将它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现象来论述。最近,正如达恩顿自己所说,他已将视线从“高层的启蒙运动”上离开,转到启蒙运动的“底层”或“下层生活”、淫秽文学、感觉主义和当时渗透进大众文化的谣言⁵。

相比之下,本书是思想史的一个课题。理性与宗教、自由与美德、天性与社会的思想,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塑造了法国、英国和美国这三个如此戏剧性地受它们影响的国家完全不同的启蒙运动⁶。在论述它们时,本书是不加争辩、不带讽刺的。与政治家及事件参与人通信的哲学家及其他人脑中迸溅出的这些思想,深入到了被近代历史学家所称的人们的**精神状态**中,以及阿历克斯·德·托克维尔意指的**道德**中。这里的**精神状态**和**道德**指:建构“一个民族整个道德和智慧”的“思维习惯”和“心灵习惯”⁷。在历史的关键时期,这三个启蒙运动体现了走向现代的不同途径,以及意识与感性不同的思维与感觉习惯。

我正是带着这种认识来想象这个以“启蒙运动”著称的现象;也正是带着这种感觉,我提议重新确立它的英国起源。法国人自己都承认可敬的英国三杰培根、洛克和牛顿的思想启发了他们自己的启蒙运动。我将不把注意力引向这些启蒙运动的先驱们(我也这样看待他们),而是超越这些,将视线引向18世纪本身,以此在法国人视为他们自己的地域范围和时空上来挑战他们⁸。正是在那时,18世纪早期,英国的启蒙运动开始了,采取了与其大陆对手(或它自己的海外子民)迥异的方式。问题不仅仅在于确立英国启蒙运动在年代上的领先性,更在于确立它的特性和历史重要性。

将英国启蒙运动带上历史舞台(更确切地说,是历史舞台的中心)的,

* 这里有启蒙运动的另外一个“底层的事”:例如,丹尼斯·狄德罗(Denis Diderot)在其死后才出版的著作揭示了一个与我们熟悉的哲人迥然有别的人物和思想者。在今天,比起《百科全书》(*Encyclopedie*)的编辑这个人物,《拉摩的侄儿》(*Rameau's Nephew*)的作者也许更有趣、更复杂,或许还更友善。但是,前者是大众所知历史上的狄德罗,启蒙运动的狄德罗。

正是对启蒙运动这个观念的重新定义。在一般的与启蒙运动相关特质——理性、权利、天性、自由、平等、宽容、科学、进步——的冗长陈述中，理性总是放在这个列表的最前面。引人注意的是“美德”这个词的缺失。但正是美德，而不是理性，使英国人占了先：不是个人美德，而是“社会美德”——怜悯、仁慈、同情，英国哲学家们认为它们出于本能，自然地将人们习惯性地互相联系在了一起。然而，他们认为理性是一个次要的、关键的角色，而不是如哲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首要的、决定性的。因此，恢复英国的突出地位就是将注意力导向通常不与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主题，也就是说导向这些启蒙运动中每一个所明示或蕴含的社会伦理。

用这种方式重新定义启蒙运动，也是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定义英国的启蒙运动本身，将其扩展到涵盖通常被认为与其不一致的思想者和行动者上。的确，他们中的一些人更经常地被归入“反启蒙运动”一类——最著名的是埃德蒙·伯克，还有更大胆的约翰·卫斯理，同时还有十几位不那么出名（对我们这个时代而言，但在他们那个时代不是这样）的慈善家和改革者，他们赋予社会伦理以实际意义。这样，我在从事一项双重的修正主义者的实践，使启蒙运动更具英国成分，也使英国的启蒙运动更具包容性。

以我在前面的方式谈及“启蒙运动”是对流行用法的一种妥协。现在，并没有很多学者具有彼得·盖伊(Peter Gay)在“启蒙运动，一次单纯的启蒙运动”中透出的自信，尽管这依然是关于它的一个流行观念。盖伊在他的三部曲的开场白中宣称：“只有一个启蒙运动。”在不同的地方，他这样形容启蒙运动：一个家庭、一个集体、一支军队和一个党派中，有来自观念不同的国家千差万别的个人，但所有这些人被一个共同的目标统一起来，形成“思考的单一模式”。更说明问题的是他对“哲人”的故意使用，在这个法语词意指“一种国际类型”的基础上来描述所有这些个人⁹。这个在那时直至现在都没有融入英语的词暗示：盖伊的书充分说明，如他所设想的，启蒙运动在本质上具有高卢起源和精神。

尽管最近有历史学家表明，启蒙运动在国家与个人之间是如此不同，以至于这个单数词使人产生误解¹⁰，启蒙运动依旧是鲜有例外地与法语联系在一起，这些说法的术语仍然是哲人使之熟悉的那些。为什么是这

样,这多少是一个谜。最明显的原因是,法国启蒙运动(似乎对当时的同时代人及很多其后的历史学家来说大约如此)真切地在现代最戏剧性的事件之一——法国大革命中实现或完成了,而这场革命被广泛认为(同样,在当时及其后)是现代世界的开端。黑格尔(Hegel)评论道:“据说,法国大革命源于哲学。”这一次,他认同这样的传统观点:“从太阳在天空中闪耀,各大行星围绕着它旋转开始以来,人们第一次觉察到人之存在的主题是他的头脑,也就是说,是他的思想,受其激发,他逐步构建了现实的世界。”¹¹

但是,可以说,美利坚共和国也是“思想”的产物,尽管是一种不同的思想。通过传播一种“新的政治科学”,美国人在现代成功地创建——“创建”,这个词本身就引人注目——了第一个可行的共和国。黑格尔本人赞赏美国为一个“世界历史”的现象:“美国从此成为一个未来之国,这里,在我们面临的时代,世界历史的责任将展现它自己。”¹²他承认,这个“未来之国”毫不受益于法国人,而在很大的程度上受益于英国人,他们的宪法使美国“在普遍的动乱中”屹立不倒¹³。

美国也许已经成为未来之国,但不是美国革命鼓舞了将来的革命。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普通革命的典范,也是启蒙运动的典范,都是法国。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经这样说:“这个问题令人伤心的事实是,以灾难为结局的法国大革命创造了世界历史,而美国革命,它如此成就斐然,却依然被人认为是一个差不多只具有局部重要性的事件。”¹⁴

法国启蒙运动现在最受人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与法国大革命的联系,还因为它的支持者故意的、自觉的,当然还有装腔作势的品性——对他们在世界历史中的身份和(远在黑格尔之前的)地位的敏感。1751年,在《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现之前问世的《序言》(Preliminary Discourse)中,编者说起在当前“启蒙世纪”达到顶峰的“启蒙运动的几个世纪”,并解释说《百科全书》将为启蒙运动这个最高级的阶段提供一个合适的知识概要¹⁵。毋庸置疑,这项事业是有史以来最具雄心的:1751年至1772年之间,《百科全书》发行了二十八卷(包括印板);到1780年,又发行了另外7卷——相比之下,英语的钱伯斯《百科全书》(这套书当时刚被翻译成法语)只有两卷,出版于1768年至1771年间的《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未翻译)只有三卷。(后者受《百科全书》这个榜样的启发或刺激,到1784年扩充到十卷本,该世纪末扩充到二十卷本,其最后一卷对《百科全书》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这些著作的名字本身意味深长,法国人缺乏与 British(英国的)(它不像 *Encyclopedie francaise* 中的 *francaise* 一样出现)等同的国家形容词,以此来确定它普遍的凭据。这套书的副标题同样具有提示性:《大英百科全书》的是“一部艺术与科学的辞典”;而法国的《百科全书》省略了最普通的不定冠词,加上了一个奇怪的形容词,“科学、艺术和手工艺经过推理的大辞典”(*Dictionnaire raisonne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etiers*)。

《百科全书》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作者:“文人团体”(*Une Societe de Gens de Lettres*)。这个因素表明了法国启蒙运动出类拔萃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它预见了一个有着明晰的特性和目的、富有凝聚力的组织,一个文人或哲人“群体”。这个群体,可以说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锋,他们不仅负责《百科全书》,还主持巴黎的沙龙,使这个城市成为欧洲的知识中心。杰出的历史学家弗朗科·文图里(Franco Venturi)基于英国思想者不像他们的法国同行,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一个特别的阶层或群体这一事实,否认有英国启蒙运动这回事。“他们没有一个他们自己的组织或节奏,从而他们没有作为一支自发的、试图质疑并取代过去延续下来的组织的新政治力量来行事。”他说,只有在苏格兰,才能找到一次启蒙运动必需的元素,“一个新的知识阶层,意识到它”用来对抗传统统治阶级“的作用与力量”。文图里推崇吉本,认为他是“启蒙运动的英国巨人”,但又说“在他自己的国家”,他是一个“离群索居的人,孤独寂寞的人”,因为在英国没有启蒙运动¹⁶ *。

如果就文图里的判断,英国没有一个“知识阶层”——一个有组织的、持不同政见的、有潜在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阶级,但他们确实拥有按照他

* 文图里考虑了18世纪共和派——共和党人和自然神论者(或泛神论者),他们是约翰·托兰(John Toland)、约翰·特伦查德(John Trenchard)及他们在前一世纪的同行的继承人——组成的一个可与哲人相比拟的有组织群体的可能性。但根据该课题最杰出的专家卡罗琳·罗宾斯(Caroline Robbins)的说法,他们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反对党”,不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党派”,因而当然不是革命者。这样,按照文图里的标准,他们将不足以使英国具有启蒙运动的资格¹⁷。

们自己的“节奏”来行事的思想者、作家、传道者和改革者，他们使伦敦，还有格拉斯哥与爱丁堡成为充满活力的知识中心。也许伦敦没有法国人引以为傲的沙龙，或使格拉斯哥与爱丁堡负有盛名的大学，但它却有咖啡馆和俱乐部，它们具备某些相同的社会功能，满足着多得多的人的需求。

伦敦还有一些流行杂志，为读者群比哲人们大得多的作者提供渠道。《闲谈者》(*Tatler*)和《观察者》(*Spectator*)聪明的主办人约瑟夫·爱迪生(Joseph Addison)和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充分意识到他们事业的目标。爱迪生在《观察者》中写道：“据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堂带来，让它在人类心中扎根；而我将满怀雄心地让这个说法用在我的身上，我已经把哲学从壁橱和图书馆、学校和学院里带出来，让它居留在俱乐部与咖啡馆里、集会中与茶桌上。”¹⁸诚如所言，事实证明《观察者》在法国同样受欢迎。1714年，它被翻译成法语，这仅仅是它在伦敦问世后的第五年；20年后，《闲谈者》也被翻译过来。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他的《忏悔录》(*Confessions*)中回忆，当他还是一个年轻人，与他的女资助人华伦斯夫人(Mme de Warens)一起在法国南部居住时就阅读这些杂志。他说：《观察者》“尤其让我快乐并对我有用”¹⁹。在他的小说《爱弥尔》(*Emile*)中，他介绍了爱弥尔与索菲之间交换书籍的事：她要给他《闲谈者》(*Telemachus*)，他要给她《观察者》(*Spectator*)²⁰。

同样，美国也有思想者、作家、传道者，尤其是政治家，他们组成了一个特别的知识阶级——这是成为政治和革命力量的另外一个阶级，而哲人们自己从来没有完全做到他们那样。

他们还设法撰写文章。《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是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它们远没有《百科全书》那样鸿篇巨制，但影响力却更大也更持久。一个世纪以后，约翰·莫雷(John Morley)在将他书架上的那些沾满灰尘的浩繁卷帙拿下时，沉思着人们也许再也不会读它们了，它们现在是一堆“有纪念意义的废墟”²¹，他以此对《百科全书》做出了充满同情的结论。对于一直都在重印中的《联邦党人文集》，却不能这样说，它们已被译成多国文字(最近译成希伯来文)，它的原则和论点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外反复被民主人士和追求民主的人士引用。(《百科全书》从没有重印过，只有部分精选的章节译成外文。)

法国相对于英国和美国的决定性优势可能就在于“启蒙运动”这个术语本身。对于这一点,后现代主义者有一个观点:语言通常是现实的,或者是人们认为是现实的。“Sicle des lumieres”(启蒙时代)这个词,早在1733年,杜波斯神父(abbe Dubos)就使用了它;1750年,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第一篇论文》(*First Discourse*)中使用了它;第二年,《百科全书》的联合主编让·勒·荣德·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在他对《百科全书》的《序言》中使用了它;在整个18世纪,其他很多人都使用过它。在语言和文化适于这种抽象的德国,“Aufklarung”这个术语在1784年关于“启蒙运动[Aufklarung]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讨论上正式出现。依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问:“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启蒙过的时代吗?”回答是:“不,但我们生活在一个启蒙运动的时代。”²²

在有启蒙运动的现实却没有合适的语言表达它的英国(这里,有人也许会说,现实阻碍了抽象概念的发展),直到很久以后,才有表达它的名词出现。1798年问世的康德论文的第一个英语译本没有用这个名词,而是用“在启蒙的”(enlightening)或“启蒙过的”(enlightened)来代替“启蒙运动”²³(enlightenment)这个词。虽然在英国没有这个名词,但它的形容词是广为人知的。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年)中,伯克带着讽刺口吻说道:“一个启蒙过的时代的爱国罪行”,没收教会财产的“‘启蒙过的’高利贷者”(这里,“启蒙过的”带引号),“这个启蒙过的时代不可冲破的黑暗。”²⁴

一百多年以后,这个名词才在英国出现。1837年,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他的《法国大革命史》(*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中,杜撰了“哲学主义”(Philosophism)这个词来形容哲人们拥护的制度²⁵。四十年以后,在其《狄德罗》、《伏尔泰》、《卢梭》传记中将哲人这个概念带入英国公众视线的约翰·莫雷,使用了“启发”(illumination)这个说法²⁶。晚至1899年,黑格尔《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的翻译者说,他不得不使用 *Eclaircissement* 这个法语单词,因为“在英语中,当前没有意指这个伟大的知识运动的说法”²⁷。1910年,对于很明显是由一位美国的黑格尔派哲学家所写的一本名为《启蒙运动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的书²⁸,

一位历史学家称其为“一个分水岭”。但正是在第二年,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问世了,其中没有关于启蒙运动的词条。第一个该类词条出现在1929年的第14版中,在这里,该说法作为 *Aufklärung* 的翻译,主要适用于德国人,它恰好也适用于英国人(洛克和牛顿)和法国人²⁹。

即使是具有某些文图里认为启蒙运动所具备特征——独特、自觉的学派——的苏格兰,直到很晚,才赢得“启蒙运动”这个称号。今天我们如此熟悉的“苏格兰启蒙运动”这个说法,是在1900年创造出来的,用来描述以“道德哲学家”(就像教授一样,他们在字面上拥有这个头衔)闻名的苏格兰哲学家³⁰。亚当·斯密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是他的前任,而托马斯·雷德(Thomas Reid)是他的继任者;杜加尔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接替了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在爱丁堡大学的道德哲学讲席。大卫·休谟(David Hume)没有拥有任何教授头衔或职位,但他在爱丁堡出生、长大,并在那里上大学(没有获得学位),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也是在那里度过,毫无疑问,他属于这个学派。然而,这些哲学家中很多人愿意把他们看成是北部英国人(North Briton),而不是苏格兰人。他们中的某些人竭力避免表现出任何苏格兰狭隘主义的迹象。斯密在牛津的六年中,自觉并成功地掩盖了他的苏格兰口音。同其他人一样,他在伦敦发表他的著作,并在居住在那里的时候写了《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的大部分。休谟把他的名字从苏格兰语的“Home”改成了英语化的“Hume”。在掩盖他的口音方面,他没有斯密那么成功,但他确实很谨慎地从他的著作里去掉了苏格兰语的习语。

因此,苏格兰启蒙运动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狭隘或排外;它也不仅仅限于苏格兰。约翰·洛克和伊萨克·牛顿通常被认为是英国启蒙运动的先驱。我自己倾向于把这个荣誉给予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the 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他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先驱,尽管他既不是苏格兰人,也不是一名教授。但毫无疑问,他们三人都是英国人。其他同样在启蒙运动中值得尊敬的人物是:约瑟夫·巴特勒主教(Bishop Joseph Butler)、威廉·帕利(William Paley)、约瑟夫·爱迪生、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托马斯·潘恩、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

和爱德华·吉本。那些出生在威尔士或爱尔兰的人——理查德·斯蒂尔、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埃德蒙·伯克,他们在英格兰生活和工作*。

然而,直到最近,英国启蒙运动还没有被承认,因为大家显然没有把英国人考虑进这个范围内。这不仅是文图里深思熟虑后的判断,也是诸如阿尔弗莱德·科班(Alfred Cobban)等杰出历史学家的判断。科班在1960年写道:“‘启蒙运动’这个说法很难运用于英国。”³² 罗伯特·R·帕尔默(Robert R. Palmer)在1976年写道:“即使人们听说过‘英国启蒙运动’这个说法,这也会有些别扭,与事实不相称。”³³ 亨利·S·康马杰(Henry S. Commager)在第二年宣称“英国有点出离启蒙运动这个圈子”³⁴。直到20世纪80年代,约翰·波科克(John Pocock)和罗伊·波特(Roy Porter)才把英国加进了这个精选的圈子,他们最终使有别于苏格兰的英国启蒙运动观念获得认可³⁵。

考虑到当时法国和英国思想者之间联系如此频繁,同时代人和历史学家把英国排除在启蒙运动的圈子之外,就更让人感觉奇怪了。他们阅读、翻译并评论彼此的著作,还互相拜访。1726年至1728年,伏尔泰曾在英国居住过,他公开声称对自己是个“英国狂”感到内疚。他的《英国书信集》(*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最先是1733年在英国的伦敦出版的,到第二年,才在巴黎以《哲学通信》(*Lettres philosophiques*)的书名出版。(尽管英语流利,但伏尔泰用法语写成此书。)在后来的一本书《哲学词典》(*Philosophical Dictionary*)中,他提到他与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的会面,引用了洛克、沙夫茨伯里,并对伊萨克·牛顿表达了特别的敬意。

比起伏尔泰(有人持这样的观点:对比法国启蒙运动,他更是英国启蒙运动的代表),孟德斯鸠(Montesquieu)与英国人靠得更近。从1729年

* 对于不承认英国启蒙运动中英格兰人贡献的历史学家来说,吉本提出了一个特别的问题。即使否认英格兰人在该启蒙运动中有任何贡献的弗朗科·文图里,也不得不认为吉本是一个例外,说他是他的国家中一个“离群索居”和“孤独寂寞”的人(而他是一位畅销书的作者和名人)。同样,一名最近的历史学家亚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他认为“创造现代世界”的苏格兰人贡献最大,坚持认为吉本的著作是在苏格兰历史学派基础上的模仿,吉本“就各方面来说……在智识上是一名苏格兰人”³¹。

到 1731 年,为了研究英国的政治制度,他特地住在英国。作为著名的《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的作者,他拜见辉格党的领袖,参加下议院的会议,通过推选成为皇家学会的一员,他获得了英国人最高的赞誉。伯克在他的《新辉格党对旧辉格党的呼吁》(*Appeal from the New to the Old Whigs*,对法国大革命的一次有力批评)临近结尾时给孟德斯鸠的颂文,其热情是在法国的孟德斯鸠同胞所不可比的³⁶。而在另一方面,另一位哲人德·霍尔巴赫男爵(Baron d'Holbach)在 1765 年访问英国,这使他对这个国家不愉快的看法加强了。更不赞赏英国的卢梭,在他在法国境内因《爱弥儿》(*Emile*)中表达的观点被下令逮捕后,于 1766 年来到英国避难。正是在英国期间,他撰写了他《忏悔录》的大部分*。

也有一些英国精英从另一方向渡过海峡,他们是: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爱德华·吉本、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霍拉斯·沃波尔、托马斯·潘恩和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8 世纪 30 年代,休谟还是个年轻人,他就在法国居住期间完成了他的杰作《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30 年后,他又回到法国,在英国驻巴黎大使馆担任秘书,在这里,他不是以《人性论》的作者著称,而是以多卷本《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的作者著称。斯密于 1765 年至 1766 年间在巴黎定居,名义上是巴克卢公爵(Duke of Buccleuch)的家庭教师,在这里,他以《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的作者著称,经常受邀参加沙龙。已经着手撰写《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的斯密,非常乐意结识诸如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及弗朗西斯·魁奈(Francois Quesnay)等重农主义的领军人物(然而,他没有转而秉持重农主义的观点)。1763 年,在去洛桑的途中,吉本在巴黎短期居住过,但在这几个月里,他认识了克劳德·爱尔维修(Claude

* 这是英国启蒙运动中一段更奇怪的插曲。休谟与卢梭在知性和脾气上很少有投合的地方,但休谟同情卢梭的不幸遭遇,安排他在英国避难,在旅程中陪伴他,并为他和他的情妇寻找寄宿处所(他的情妇由詹姆斯·博斯维尔[James Boswell]陪伴单独来到英国)。休谟甚至主动提出为卢梭从乔治三世那里申请养老金,卢梭在开始时拒绝了这项提议,但接着又不情愿地同意了。但是,不久之后,卢梭就开始与休谟反目,指责他传播一封霍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嘲讽他的信,图谋败坏他的声誉。整个事件公开了,无比沮丧的休谟被迫发表他们之间的通信,以此来为自己辩护。

Helvetius)、德·霍尔巴赫男爵和其他一些启蒙运动的杰出人士。(几年前,他在洛桑结识了伏尔泰。)1792年,潘恩在发表了《人权论》(*Rights of Man*)后,移居巴黎,被推举为国民公会的荣誉会员。尽管普里斯特利选择住在美国,但他还是在国民大会中拥有一个荣誉席位。

书籍和观念比它们的作者更容易被广为人知。狄德罗从来没有到过英国,但他的第一部著作是1745年沙夫茨伯里《论功德与美德》(*An Inquiry Concerning Virtue, or Merit*)的译本。第二年,他自己的书《哲学思想》(*Pensees philosophiques*)出版了。文图里认为这本书是“英语作者夹缝中的评论”(但文图里将这本书描述为“对激情的有力呼吁,以把人们从压迫他的一切中解放出来”,很难称得上是沙夫茨伯里的精神。沙夫茨伯里呼吁激情,不是为了解放人,而是想让人更有道德)³⁷。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两次被翻译成法语(一次由孔多塞的妻子翻译),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很快也翻译成了法语。孔多塞本人为这本书写的概要,接着也被翻译成了西班牙语。

《百科全书》在英国的遭遇更加复杂。它的第一版在好几个大学的图书馆都能找到,包括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斯密将这套书作为礼物赠送给了它。当时甚至出台了一些翻译这套书的计划,其中一项计划看起来在某些方面花费很低(八部分——二十四张纸——实际出版于1752年)。1768年实施的另一项计划,其结果只是第一卷的某些摘选部分得以出版。《百科全书》只受到几则简短的评论,其中一则是斯密1756年发表在《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上的,他有所保留地推荐了这套书。奥立佛·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及其他人,还有英语词典的编纂者,更多地是剽窃它,而不是引用它。斯密从《百科全书》第五卷“*Epingle*”词条借用了那个著名的制造厂的实例³⁸。

斯密和休谟两人都对法国的文化问题有着强烈的兴趣。1759年,休谟推荐斯密阅读刚刚出版的爱尔维修的《论精神》(*De l'esprit*)和伏尔泰的《老实人》(*Candide*)³⁹(然而,休谟没有答应爱尔维修的要求,去翻译《论精神》)。几年之前,在新创办的《爱丁堡评论》上,斯密善意地提到达朗贝尔的《序言》,并评论(不无严厉地)了卢梭的《论科学和艺术》,文中包含了从这本书中抄取的一段很长的摘录。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斯密引